

書海眺望

談幾本經濟類的書

張 元

我在大學的時候，沒修過經濟學的課，偶爾翻翻這類的書，完全讀不下去，也就敬而遠之了。然而，今天如果要問：哪一門學問與我們的生活最有關係，大概非經濟學莫屬，這樣說來，不讀這一類的書，終究是一大缺憾。既是缺憾就需彌補。近幾年，讀了若干經濟類的書，當然也都是一些寫給社會大眾看的通俗讀物，自己覺得頗為受益，也就在上課的「開場白」中介紹給同學。同學的反應不一，有的喜歡，說受到啟發；也有不喜歡的，說這學期老師介紹了「一堆」經濟學的書，其實只不過二、三本而已。我挑選幾本推薦給您，也是野人獻曝的意思。

(一)

高伯瑞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 的《揭開皇后的面紗—造成當代亂象的經濟學迷思》(*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Truth for Our Time*) (羅耀宗譯，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6) ，是一本僅有稀稀疏疏 114 頁篇幅的小書。作者高伯瑞撰寫此書時，已高齡九十有三。他不但年壽很高，六呎八吋 (204 公分) 的身材也高，學術成就更高，他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也是歷任美國民主黨總統的財經顧問。然而，他卻不認同當代經濟學的主流理論，相當抗拒受到數字、公式、抽象模型等科學訓練方式轉化的經濟學。他主張政治、變遷力量以及人性支配同樣是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他深受凱因斯的影響，反對以自由放任的手段來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這本書可以說是他「畢生經濟反思的最後綱領」，這也是本書南方朔所撰推薦序的標題。

高伯瑞在「寫在前面——一點個人感想」中對書名作了解釋，先錄於下：

我在書中指出所謂「無罪的詐欺」(innocent fraud)，其始作俑者並非刻意如此。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偏離事實的觀念如何成形。這裡面不涉及明顯的法律問題。這個現象引發的反應，主要來自個人與社會信仰的檢討，而不是法律方面的犯行。這中間看不到沉重的罪惡感，比較常見的反而是行為者的僥倖自得。

我再選錄幾段高氏的原文，讓我們看看他一生從事經濟學工作，晚年反思的一些片段。

GDP 的表現好不好，是用物質商品和服務的產量多寡來衡量。它不採計教育、文學或藝術，只看汽車等商品的產量。這便是當代評估經濟和社會成就的標準。人類歷史的精華，是來自社會的藝術、文學、宗教和科學成就。它們才應該是衡量成功的標準。義大利佛羅倫斯的藝術，以及威尼斯、莎士比亞、華格納、達爾文精采絕倫的民間創作，都來自 GDP 占比極低的社群。這些人有幸生於不受推銷術和操控大眾反應等手法的時代。今天，只有文化保存、藝術、教育和科學等生活產生的人類成就指標，比金錢更具有代表性。(頁 46)

金融這一行的從業者以為他們掌握了未知世界的知識，別人也相信他們辦到了；由於他們預測的事情，正是其他他人希望聽到，並想從中獲利或者得到某些報酬，因此這種期待或需要便掩蔽了事實。在金融市場，我們讚揚，甚至歡迎這個本質上錯誤的行為。共同的錯誤也受到很好的保護。這不再是個人的問題。金融世界豢養著一個廣大、積極、報酬優渥的社群，而這個社群是靠著錯縱複雜且不得不然的無知而成形。(頁 80)

在美國，尤其是處於經濟停滯不前和衰退的時候，所得比較低的公民，對教育、醫療健保的需求格外殷切，所以必須擁有某種形式的基本家庭所得才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需求增加的情況下，總是縮減社會支出。本書撰稿時，這種現象尤其明顯。結果造成的整體影響，是個人和家庭的所得與福祉減低—也就是在經濟衰退的時候，沒有採取有效的矯正行動。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情況正是這個樣子。在經濟政策的歷史上，它經常和經濟福祉相互抵觸。而且，它可能無法帶來明顯的效果。錢可能流到不會去花用的人手中，會花錢的人卻沒錢可用。經濟衰退不受刺激性的公共政策影響。有時，即使採取的行動缺乏效果，經濟卻會漸露曙光。(頁 111)

我讀高伯瑞的這本小書，深感人世間的道理其實並不複雜，稍加思考即可瞭解。未來的情況，由於影響因素眾多，無法預料，金融界卻販售未來的利潤，就是不合道理的事。這種事做得愈多，失敗後的惡劣影響就愈大，高伯瑞可說已預知 2008 年華爾街的金融風暴，只是未料到規模居然如此之大。再說，私部門侵

入公部門，用各種手段鼠噉蟲蝕，結果是少數，或極少數人腦滿腸肥，廣大的民眾卻無法得到中等的生活，整體經濟發展為少數或極少數人所竊奪，真是「是可忿，孰不可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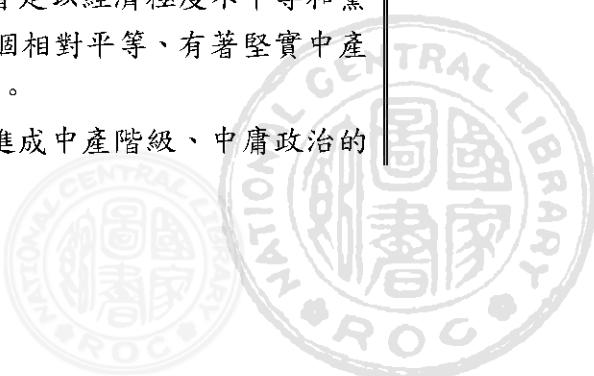
(二)

克魯曼（Paul Krugman）著，吳國卿譯的《下一個榮景—當經濟遇上政治》（*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台北：時報出版社，2008 年；簡體版好像直譯書名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這本書出版之時，許多人預料克魯曼將會得到諾貝爾經濟獎，果不其然，2008 年，他就獲得這項榮銜，只不過他的得獎與此書關係不大。克魯曼當然是十分傑出的經濟學家，令我最為敬佩的，一是他的文筆極佳，本書封面裡的簡介寫道：「《財星》雜誌說他是『自凱因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他的文筆優美又有創意，克拉克獎評審委員會認為足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金森的詩和馬蒂斯的油畫。」二是他的濟世熱忱，他被認為是一個愛管閒事的經濟學家，他在紐約時報寫了八年時評專欄，對布希政府的批評可說不遺餘力。克魯曼得到諾貝爾獎，中國時報民國 97 年 10 月 15 日的「國際專欄」刊有林博文〈自由派專欄作家克魯曼〉一文，其中寫道：「不少人把克魯曼和當年哈佛自由派經濟學家高伯瑞相比，高氏愛寫政論文章，也愛上電視評論時事，他和克魯曼都屬於第一流的公共知識分子。但克魯曼更厲害，『術業有專攻』，他在宏觀經濟上的造詣，對國際貿易和空間經濟的貢獻，得到了國際公認。而他過去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以及對此次華爾街大崩盤的警告，使他成為真正名不虛傳的經濟學家。」讓我們選讀《下一個榮景》書中的片段，我們先選書中開頭的部分：

戰後美國特別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社會，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大幅攀升的薪資，使數千萬美國人—包括我的父母—擺脫都市貧民窟與農村的窮困，得以擁有住宅和史無前例的舒適生活。另一方面，富人階級的地位下降：他們人數雖少，且與興旺的中產階級相較已不再那麼富有。窮人仍然比富人多，但他們相對仍是少數。結果是，社會呈現一種明顯的經濟共同感：美國大多數人過著明顯相類似、且相當優渥的物質生活。

在經濟平等的另一面是溫和穩健的政治。在我年輕的時代（大多數但非全部時候），民主黨與共和黨間對外交政策和國內的許多方面，都有廣泛的共識。……任何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美國並非一向如此，我們曾是以經濟極度不平等和黨派惡鬥著稱的國家。……既然美國已經成熟長大，一個相對平等、有著堅實中產階級與穩定政治環境的社會，應該是美國的正常狀態。

不過，在 1980 年代，我們逐漸看清，在美國演進成中產階級、中庸政治的



國家後，故事並未就此結束。經濟學家開始發現不平等急遽上升：少數人遙遙領先，但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只前進一小步，甚至沒有進步。政治科學家開始發現政治加速兩極化：政治人物偏向左、右兩個極端，「民主」與「共和」兩個詞愈來愈像「自由」與「保守」的同義詞。這些趨勢持續到今日：今日所得不平等大到就像 1920 年代，而政治兩極化也嚴重到前所未見。

現代美國史有兩條大軌跡——一條經濟軌跡是從高度不平等到相對平對，然後又回復到原點；另一條政治軌跡是從高度兩極化發展到兩黨合作，然後回到原點。(頁 15-17)

我們再選幾段全書結尾部分的文字：

在 2005 年之前，每年申請破產的家庭已達到 1980 年代初期的五倍。破產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負擔更多債務——而這也招致人們花太多錢在奢侈品的道德譴責。不過，學者發現，中產階級家庭花在奢侈品的錢事實上比 1970 年代少。債務攀升主要反映在住宅的支出增加，原因是想住在好學區的競爭激烈。中產階級美國人陷入了一場老鼠賽跑中，不是因為他們貪婪或愚蠢，而是他們在愈來愈不平等的社會中想給孩子多一點機會。而且他們有理由擔心，壞的開始可能毀掉孩子過好生活的機會。……美國的機會與結果都存在了高度的不平等，我們可能相信人人都可以靠努力和決心獲致成功，但事實呈現的卻非如此。

美國的高度不平等為社會帶來的沉重成本，絕不只是壓抑大多數家庭的購買力。不平等還有一個傷害我們的方法：它腐蝕我們的政治。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1913 年以現代的總統幾乎不可能說的話說：「如果這個國家有一群人大到足以占有美國政府，他們就會佔有它。」現在就有這麼一群人，而且真的占有美國。當然，還不完全占有，但我們幾乎每週都會聽到美國政府政策遭到金錢扭曲的報導。

在本書付印時，就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連部分民主黨人都響應支持那些享有極高稅務優惠的避險基金經理人。藉由稅法的扭曲解釋，這些經理人——其中有些一年賺進超過十億美元——大部分的獲利都可以依照 15% 的資本利得稅率繳稅，而其他高所得者卻適用 35% 的稅率。避險基金的稅務漏洞每年造成政府損失超過六十億美元，相當於提供醫療給三百萬名兒童的成本，其中將近二十億美元落入二十五個人的口袋。即使保守派經濟學家也認為，這種稅務優惠不合理，應該取消。……美國政治的醜陋有一大部分是我們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映射。

在 60 年代，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政府在「為所有人謀福利」；今日，大多數人相信政府「為少數大利益團體謀福利」。有明確的證據顯示，日增的不平等造成

我們日益憤世嫉俗，使得美國愈來愈像拉丁美洲國家。政治科學家烏斯藍納(Eric Uslaner)和布朗(Mitchell Brown)指出(並提供詳盡的佐證資料)：「在一個有錢和沒有錢涇渭分明的世界，位於經濟光譜兩端的人沒有理由相信『可以信任大多數人』……社會信任是建立在經濟平等的基礎上。」(頁 260-264)

我們要了解今天的世界，首先應該了解哪個國家？我想還是美國。我們怎樣才能了解今天的美國呢？應該從歷史上看，最近百年來，美國走過怎樣的道路。克魯曼就是從十九世紀末講起，重點在自由與保守兩股政治力量、政治態度、實際作法的對立、互動、競爭，一直講到 2007 年的情況。自由主義主要指民主黨，1933 年的新政是一項重大的指標，它建立了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保守主義指共和黨，是一個反對福利國家，不強調照顧弱勢，只為了菁英分子著想的黨。不過，艾森豪雖是共和黨，卻繼承了小羅斯福的「新政」，仍走中產階級的路線，尼克森基本上也是如此。直到 90 年代後期，保守主義運動藉著種族操弄、愛國主義、反共產黨等手段技倆，得到南方白人的支持，贏得 2000、2002、2004 年的大選。從此財富落入少數人手中，一般人民生活明顯下降，中產階級大受威脅，於是 2006 年民主黨大勝。

克魯曼認為今天的美國是一個貪婪不受譴責，沒有道德理念的不平等社會。他強調唯有社會平等方能保證民主的正常發展，他建議從全民健保做起，本書中作了頗為詳盡的分析與說明。不過，寫本書「推薦序」的吳惠林就不同意克魯曼的這一主張；吳惠林說：「我很認同並欣賞克魯曼講的美國故事，但對他的詮釋和解讀卻難苟同，特別是他認為政府應『強制性』地實施全民醫療保險和全民健保。」

克魯曼可以說是講故事的高手，把百年來美國經濟與政治的演進，作了清晰而又中肯的敘述，生動精彩，我們很可以得到閱讀歷史的深度與樂趣。吳惠林顯然不贊同克魯曼的經濟主張，認為克魯曼「比凱因斯更像凱因斯，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也顯示出吳惠林不認同凱因斯，而是欣賞海耶克，也許還有傅利曼，所以會說：「對於這本書，我雖認同克魯曼同情弱者，幫助弱者的『溫暖的心』，但他偏向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社會主義者』之藥方，其實很危險。」我是不贊成這位寫推薦序的學者，我還是喜歡高伯瑞、克魯曼這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主張。相對而言，我不喜歡傅利曼那種站在凱因斯對立面，反對政府干預，高唱貿易自由、開放市場，以計量方式為主要手段的經濟學。然而，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出版者，居然請了一位與著者有不同意見，或者可以說是不同學派的人寫推薦序，就可以看出傅利曼影響之大了，我們怎能不了解傅利曼是一位怎樣的經濟學家呢？



(三)

藍尼·艾伯斯坦 (Lanny Ebenstein) 著，陳儀譯，《傅利曼的選擇》(Milton Friedman : A Biography) (台北：財信出版社，2008) 是一本傅利曼的傳記。由於撰者是一位經濟學家，也有豐富的傳記寫作經驗，所以，這本書讀起來十分順暢，可以讓我們一直讀一直讀，幾乎到了不忍釋手的地步，這也許是傳記類書籍的優勢，比起其他類的書，容易吸引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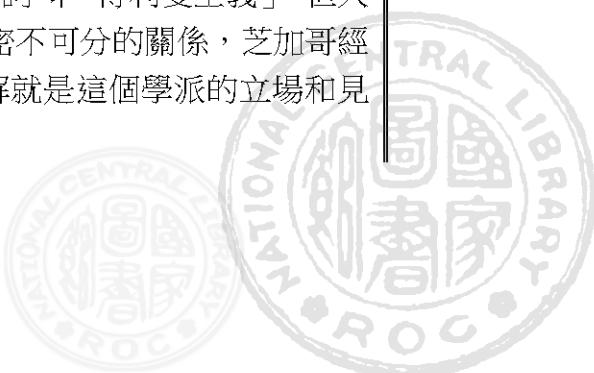
米爾頓·傅利曼 (1912-2006)，生於美國紐約，父母是來自匈牙利的猶太移民。「從幼年到青少年，米爾頓一直是貪婪的讀者和優秀的學生。他在當地的公共圖書館裡讀過非常多的書，這個圖書館是由鋼鐵大王卡內基創建。傅利曼在口語和寫作能力上十分流利、清晰且快速。」(頁 49) 羅格斯大學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一年後得到經濟學與數學兩個碩士學位，由於哥倫比亞大學提供優渥的獎學金，再到哥大經濟系就讀。讀了一年，他到「新政」下的華盛頓工作，二年後再到紐約的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傅利曼回到學術界，他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先在明尼蘇達大學，再轉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從此逐步成為經濟學界的風雲人物。

這是一本「好看」的書，對於我們擔任教書工作的老師來說，我很推薦您讀讀此書的第十章，「教授生涯」。書上說，傅利曼自我介紹喜歡自稱「經濟學教師」，讓我們讀讀這一章的頭尾兩段文字：

傅利曼從米契爾身上學到一生受用的教誨。米契爾很早就告訴傅利曼：「如果你無法清楚不含糊地表達，代表你不了解這個論點。」傅利曼後來也如此教誨他的學生。文字真是很重要。(頁 149)

米爾頓認為教導一門學科是學習這門學科的最佳途徑。透過教學，就能了解自己對於這門學科的知識是否不足。此外，向學生表達他的思想，可以改善他的解說內容與方式 (尤其是能為大眾理解的解說)。他深信「教學相長。」(頁 162)

傅利曼在經濟學上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高伯瑞就說：「在經濟史裡，」「凱因斯時代被傅利曼時代所取代。」(本書，頁 173) 傅利曼如何談凱因斯呢？本書撰者說：「傅利曼並未高調斥責凱因斯和凱因斯主義，他非常有耐性，以一種詳細解釋理論和說明具體事實的方式來表達為何他認為凱因斯分析無效。」(頁 179) 我們並未見到一個名詞叫「傅利曼主義」，但大家都聽過「芝加哥學派」，而這個學派與傅利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芝加哥經濟學派大致上就是傅利曼經濟學派，他的立場和見解就是這個學派的立場和見解。傅利曼自己說：



對全世界的經濟學家來說，「芝加哥」代表的不是一個城市，甚至不是一所學校——而是一個「學派」……在討論經濟政策方面，「芝加哥」擁護的觀點包括：相信自由市場效力是使資源運用更井然有序的手段、懷疑政府干預經濟事務的效果，它也強調貨幣數量是製造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討論到經濟科學時，「芝加哥」支持以嚴肅的態度，將經濟理論視為工具，以這個工具分析各式各樣具體問題的……方法；支持一個堅持以實證方式測試理論的方法。（頁 206）

傅利曼不只是一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一位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不過是保守的公共知識分子。本書作者說：「1950 年代末期到 1960 年代初期，傅利曼並非唯一倡議自由意志主義社會的人。當時，最知名且廣受歡迎的人還有高華德參議員和小說家艾茵·蘭德（Ayn Rand）。……傅利曼回到芝加哥大學不久之後，就加入了高華德的總統競選團隊。這時的傅利曼以『美國主要保守經濟學家』逐漸聞名。」（頁 226）艾茵·蘭德的名字，我們很少聽聞，但值得注意，她的小說對美國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我看來，負面多於正面。本書作者又說：「傅利曼是 1960 年代末期最頂尖的保守派公共知識分子，不僅在美國，可以說是全世界的第一把交椅。」（頁 264）這位全球第一把交椅的保守派公共知識分子，惹了不少爭議，他涉入智利事務是其中之一。本書撰者概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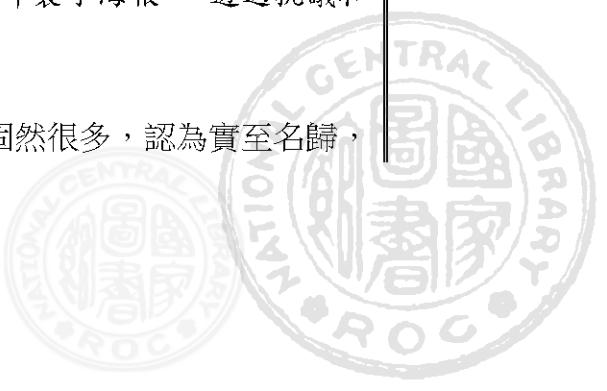
1957 年到 1970 年間，大約一百名智利學生在芝加哥大學修習經濟學。傅利曼很少和他們接觸。他認識這些學生的唯一管道通常是因為他們修了他的課，或去參加他的貨幣與銀行專題研討會。這些學生回到智利後倡議自由市場，成為知名的「芝加哥男孩」。

皮諾契特將軍發動政變，在 1973 年取得政權，導致民選總統沙瓦多·阿蘭德身亡。政變之後，隨著時間的發展，「芝加哥男孩」漸漸成為新政府的主要經濟顧問。1975 年三月，傅利曼和芝加哥大學另一位教師阿諾·哈爾伯格（Arnold Harberger）到智利訪問六天，那時哈爾伯格主持了一個芝加哥—智利計畫。

小布希總統於 2002 年在讚揚傅利曼各項貢獻的演說中特別點出他對智利的影響：「我們見到，傅利曼的想法已在智利發揮影響力，一群名為『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並為該國的經濟成就奠定良好基礎。」

1975 年九月，《紐約時報》報導傅利曼是「引導軍人集團經濟政策的明燈。」又於次月的專欄中宣稱智利「軍人集團的經濟政策以傅利曼的概念為基礎。」這些報導引發芝加哥大學許多學生展開抗議行動。學生印製了海報：「透過抗議和揭發手段將傅利曼踢出校園。」（頁 273-275）

1976 年，傅利曼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祝賀的人固然很多，認為實至名歸，



反對的人也是不少。《紐約時報》刊登了兩封譴責的信，每封都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國家》雜誌對於傅利曼「被記錄為許多高壓統治政權的諮詢者和顧問」一事曾表示：「他的客戶裡有智利的軍人集團，這個集團……已成為世界上最高壓與最殘忍的政府之一。」（頁 277）諾貝爾獎頒獎當天，有幾千人集聚在斯德哥爾摩抗議。諾貝爾獎章送到傅利曼面前時，一個示威者甚至起身大喊：「和資本主義一起下台吧！為了智利的自由。」（頁 279）

本書的結語，作者引了一段傅利曼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曾提及傳記價值的文字，這段文字很值得我們細細咀嚼。亦錄於下：

實證經濟學的進展不僅要求對現有的假設進行測試與闡述，也要求建構新的假設。這個問題的形式標準其實沒有太多好說的。假設的建構是靈感、直覺、創造力的一種創意行動；其精髓是能在熟悉的題材中找出新的觀點。這個過程必須從心理範疇來討論，而非邏輯；必須研究自傳與傳記，而不是科學方法的論著；還有，以格言和範例來推進，而不要採用演繹推理（詭辯）或定理。（頁 336）

（四）

我讀的第一本通俗的經濟類書籍，是 2001 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寫的《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7），讀得很慢，每一段都要看兩遍才能懂得他的意思。去年我讀他寫的，彭雪影、朱家一譯，《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Free Fall :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10）好像就容易一些，大概是自己多讀了一點書，有了一點長進。我覺得這是一本很重要的書，今天的世界，最為要緊的情況無疑就是：美國怎麼了，怎麼會發生 2008 年的金融風暴？美國政府應付的情形如何？這個事件的深層意義是什麼？這些對於所有今天世界的實情，明天世界的狀況，可說是關係最為密切的事；我們應該讀這本書，我相信從這本書中能夠得到頗為中肯的信息。關於這本書的要旨，封面裡的簡介中作了說明，茲錄於下：

史迪格里茲發揮學術專業及深入淺出的教學功力，為一般讀者解釋經濟風暴背後的成因，包括金融業放寬管制、薪酬獎勵誘使專業人才铤而走險，以及雷根時代以降的自由放任主義當道，本書除了抨擊當前金融紓困政策的不公，讓未來世代提前負債，也提出當前全球需要聯手解決的區域失衡、資源流失等環境議題。這些必須與經濟復甦一起考量，史迪格里茲提出了全球性的願景，為終日勞苦的平民百姓發聲，也暴露出各國政策制定者的短視與捉襟見肘。

這本書一打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麼四行字：

謹致我親愛的學生，
我從各位身上得到無數啟發，
但願此書帶給大家深刻而寶貴的教訓

未來不致重蹈我輩覆轍。

請問：這幾句話中，最要緊的是哪幾個字？應該是「我輩覆轍」吧！這四個字指何而言呢？「我輩」應該說的是史迪格里茲這一代的經濟學家，那麼，「覆轍」呢？是指金融風暴吧，是這一代的經濟學家讓平民百姓生活受苦的學說理論或主張政策，那麼，這套經濟學說，又是指何而言呢？我們讀了，就知道了。

經濟學裡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史迪格里茲對這個概念，不無意見，他說：

我們大多不敢想像，我們居然會符合奠定現行經濟基礎的人性觀點，這模型裡的人是一個會算計、理性、自私且自利的個人。沒有容納人類同理心、公益意識或利他主義的空間。經濟學有一個很有趣的面向，以這個模型用來形容經濟學家，要比形容其他人來得更貼切，而且學生研究經濟學越久，他們就變得越像這個模型的個人。(頁 345)

這樣的「經濟人」的一些作為，造成了 2008 年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其影響十分深遠，不只限於全球經濟。作者在第八章「從全球復甦到全球繁榮」中，立了一節「美國式資本主義失去人心」，說道：

對許多其他國家來說，政治的後果更為錯綜複雜，而且可能是極為可悲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在它們的戰後體制嘗受悲慘失敗後，一般都轉向資本主義，但有些國家轉成扭曲版的市場經濟：它們以傅利曼取代馬克思，當作它們的神祇。這個新宗教不太適合它們。許多國家也許會有如下結論，不只是美國式、無束縛的資本主義已失敗，市場經濟這個理念本身也失敗了，而且真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行。老式的共產主義不會復返，但各式各樣過渡的市場干預會復返。而這些都會失敗。

民主信念是另一個受害者。開發中世界的人們看到華府，會看到一個容許華爾街訂下自私自利法規的政府體制，讓全球經濟曝露於風險當中，當遭受懲罰報應的日子到來，華府卻找那些來自華爾街的人及其狐群狗黨來設法解救，做法就是將最貪腐開發中國家做夢也無法想像的龐大錢財交給了華爾街。他們看到美國

式貪腐，也許只是手法更老練巧妙罷了，雖然沒有在漆黑角落交付鈔票袋，但卻是一樣邪惡。他們看到財富持續重分配到金字塔頂端，擺明了吃定普通老百姓。他們看到監督泡沫成長的機構，像是聯邦儲備體系，被授予更大的權力，形同獎賞它過去的失敗。簡言之，他們看到美國民主制度，在政治問責上有根本性問題。看了所有這些，他們會輕易地下結論，民主本身有非常不對的地方，而且或許是無可避免的。(頁 315-316)

本書第十章，標題為「迎向全新的社會」，史迪格里茲提到了「道德」，這在一般經濟類的書中，恐怕是較少見到的。他說：

我看到太多的頂尖學生投入金融業，他們擋不住百萬美金的誘惑。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最好的學生投入科學、教育、人文學科或醫學，用智慧改變世界。我清晰記得雙親的教誨，當我就像所有十幾歲的小伙子，茫然不知未來方向，他們說，「錢不重要，它不會帶給你快樂。運用上帝賜給你的腦袋，好好服務其他人，這才會帶來成就感。」(頁 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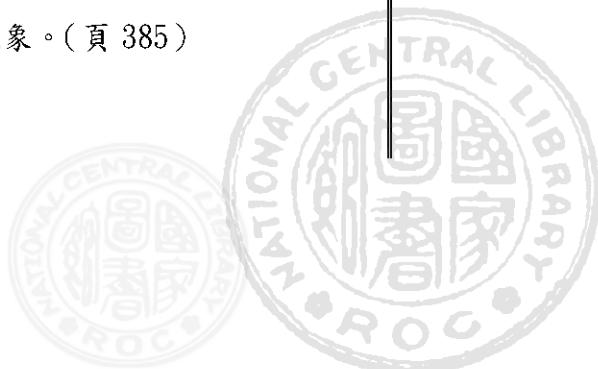
讀這段文字，我特別有感觸。二十世紀人們能夠過著「史無前例」的好生活，是在一種怎樣的觀念下，經過多少人的辛勤努力，方才得到的，史迪格里茲父母的話，就是最好的例證。我想起前時介紹過的一本書《最後的邀請—父予子的告別禮物》(台北：時周文化，2009)，作者帝奇亞諾·坦桑尼參加女兒劍橋大學畢業典禮時的感受：「那時候音樂學院畢業典禮剛剛結束，午後有溫煦陽光照耀著，我們站在美麗的草坪上和她的同學閒聊。當時聽到的話讓我氣憤極了，也證明了我們那一代的反常。她的同學中，居然沒有一個人想當老師，沒有人想啟發下一代對歷史與文學的熱情，或是到廷巴克圖教非洲小朋友學英文。他們都想進金融界，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個晴天霹靂。」當頂尖學生到金融界工作，他們對人類的福祉增進了多少？大概一點都沒有；他們增進的，大概只是史迪格里茲筆下的「道德赤字」。史迪格里茲又說：

最不能原諒的地方是道德敗壞，金融業剝削美國窮人，甚至剝削美國中產階級。金融業發現了金字塔底層有錢，想儘辦法合法（很多作為超越了法律）將錢搬到頂層。不過，我們的重點不在質問監理當局為何不出手阻止，我們應該問那些做這種事的人，良心到哪裡去了。(頁 383)

以賺錢為人生終極目標，沒什麼行為是不能做的。(頁 383)

經濟學在無意之間助長了這種缺乏道德責任的現象。(頁 385)

最後，再錄本書的最後一段文字。



且看老生常談的「危機」這個中國字，其中有「危險」與「轉機」。我們看到了危險。問題是，在市場與國家之間、在個人主義與社群共同體之間、在人類與自然之間、在手段與目的之間，我們會把握機會重建我們的均衡感嗎？我們現在有機會建立一個新的金融體系，做我們人類需要金融體系做的事；建立一個新的經濟體制，創造有意義的工作機會，創造正派工作給所有那些想要的人，那種可以縮減而非擴大貧富差距的工作；而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新的社會，每個人都可實現他的抱負，發揮他的潛能，在新社會中，我們培育符合共同理想與價值的公民，我們培育一個善待我們的星球、並尊重其長期需求的社群共同體。這些都是機會，如今真正的危險在於，我們不去把握它們。（頁 406）

這段話，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結語，本文就此打住。

（五）

我本想再介紹的書是一本，也可以說是一套三本，那樣文章就會太長，只有留待以後了。三本書是《經濟殺手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著，戴綺薇譯，台北：時報出版社，2007。以及《經濟殺手的告白 2—美利堅帝國陰謀》，作者相同，黃中憲譯，出版社同，2008。還有《經濟殺手的告白 3—不願面對的金融真相》，作者、譯者、出版社同前，2010。按：該書的第二章，標題為：「巨人對決：凱因斯對傅利曼」。這本書，我是從張翠容寫的《拉丁美洲的真相之路》(台北：馬可孛羅出版社，2009)一書中知道的，介紹給同學之後，有同學告知，出了第二集，又有同學告知出了第三集。如果你沒有很多時間看書，只能挑一本讀的話，我建議你看第二本。

我近來讀過此類書籍，有的曾介紹給同學，有的尚未介紹的有：

《偉大經濟學家海耶克》，施建生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7。施建生，是我在讀台大時的經濟系教授，做過經濟系主任、法學院院長。

《價格戰爭》(*The Value of Nothing—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拉吉·帕特爾(Raj Parel)著，閻紀宇譯，時報出版社，2010。

《為什麼是凱因斯》(*Keynes—The Rise, Fall, and Re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著，黃煜文譯，商周出版社，2010。

《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Bad Samaritans—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張夏準(任教英國劍橋大學的韓國經濟



學家）著，胡瑋珊譯，博雅書屋，2010。該書《中國時報·開卷》選入年度翻譯類十大好書。另外，再介紹一本與經濟有關的書：《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著，吳國卿、王柏鴻譯，時報出版社，2009。書中多處提及傅利曼、芝加哥學派和芝加哥男孩；當然，絕非稱讚。

（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